

论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思想超越性的四重维度

李艳艳

(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83)

摘要: 推动人类文明持续进步, 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诉求, 也是古今中外思想家们探讨的重大课题。作为西方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成果, 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思想之所以能够产生深远的理论与现实影响, 是因为它在超越西方先验理性主义文明思想基础上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路径。这体现在: 对于文明进步的基础, 提出以“自主活动”超越“精神进步”的观点; 对于文明的进步方式, 提出以“阶级斗争和文明交流”超越“教化”的观点; 对于文明进步道路特征, 提出以“多样性”超越“单一性”的观点; 对于文明进步的阶段, 提出以“奴隶制文明—农奴制文明—雇佣劳动制文明—真正的普遍的文明”超越“野蛮—文明”二元论的观点。正是在上述四个方面实现逻辑的超越,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思想才对人类文明的认识作出了突破性贡献。

关键词: 文明; 马克思; 恩格斯; 先验理性主义; 超越性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18)06-0028-06

推动人类文明持续进步, 一直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的价值诉求。文明理论揭示了人类文明进程的深层规律, 成为自古以来思想家们关注、研究的重要论域。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思想作为近代文明理论发展的代表性成果, 之所以能够产生深远的理论价值与现实影响, 是因为它在超越西方先验理性主义文明思想传统的基础上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认识图景。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思想的本真精神及其当代意义问题上, 虽然也关注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对文明理论发展作出的突出贡献, 但是, 许多这类研究仅停留在从文明概念、文明起源、文明形态、文明类型等识角去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思想。事实上,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理论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超越西方先验理性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之上, 是一个整体性的思想体系。如果仅仅从单一维度进行文本解读, 难以揭示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思想的深层逻辑, 从而难以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思想相对于西方先验理性主义文明思想的超越性, 更加难以呈现马克思、恩格斯文明理论的整体性特征。鉴于这种情况, 本研究从文明进步的基础、文明进步的方式、文明进步道路的特征与文明进步的阶段四个维度指出,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思想相对于西方先验理

性主义文明思想传统, 实现了从精神进步到自主活动, 从教化到阶级斗争与交流互鉴, 从单一性到多样性, 从“野蛮—文明”二元论到历史阶段论的全面超越。

一、文明进步的基础:从精神进步到自主活动

对文明进步基础问题的认识差异, 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思想与西方先验理性主义文明思想分野的显著标志。从本体论视角来看, 在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思想史中, 众多思想家认为理性是世界的本原和人的本质存在。一些西方学者在先验理性主义的哲学致思路径中, 主张把“人的自我完善化能力”视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础, 以伏尔泰、孔多塞为代表的近代西方思想家甚至直接把文明进步史归结为人类精神进步史。在“意见支配历史”的逻辑思维中, 霍布斯、洛克试图建立体现公共理性的国家制度; 卢梭诉诸构建完善的契约国家; 孟德斯鸠则希冀促使法律制度趋于完善; 圣西门、傅立叶等社会主义理论家也寄希望于少数天才人物的自我觉悟, 试图通过构建理性的社会秩序进而解答人类文明始终在对抗中进步的历史谜

收稿日期: 2018-06-09; 修回日期: 2018-09-21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超越卢梭: 历史唯物主义文明理论的生成路径研究”(FRF-TP-17-017A1)

作者简介: 李艳艳(1981—), 女, 四川广元人, 博士后, 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网络文明与文化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 唯物史观与人类文明进步规律, 联系邮箱: liyanyan@ustb.edu.cn

题。在这类先验理性主义文明观中，抽象的精神进步被视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最终动力，人类文明进步的途径也被相应地归结为理性的完善。

明显不同于西方先验理性主义的哲学致思路径，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不再踟躅于人本主义抽象的思辨领域，而是将“现实的人”作为其逻辑致思的起点。他们在对“现实的人”进行深入把握的基础上提出了“自主活动”这一重要的概念，此概念可以作为我们开启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思想体系的一把钥匙。“自主活动”这一概念，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标志性著作中首次明确提出，并做出了较为详细的阐述。他们的文明思想逻辑受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所影响，“文明时代”的人们总是处于一种“受制约的交往”形式之下，当这种社会交往形式与生产力状况之间呈现彼此适应的关系时，社会交往形式即社会生产关系就“是个人的自主活动的条件，并且是由这种自主活动产生出来的”，但是在私有制的生产关系条件下，上述两者不相适应的情况总会反复出现，从而“变成了自主活动的桎梏”^{[1](575-582)}。

就其本质而言，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自主活动”是作为社会历史演进的基础的“实践”，尤其是以生产劳动为主要形式的实践活动。具体地说，他们认识到，“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519)}，既然有生命的个人是诸种实践活动展开的前提，人类文明史展开的前提就要满足现实人的生活需要。既然人类产生之初对吃、喝、住、穿等生活资料提出了需要，那么人类首先就要“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531)}，以满足自身对基本生活资料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对“实践”概念的探讨，从哲学思辨层面具体化到了现实社会生活层面。他们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对于实践问题不是进行形而上学的逻辑推演，而是落实到具体生活之中进行探讨。不仅如此，他们还在诸多的实践活动形式中，把物质资料生产劳动作为一种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形式加以重视，认为它作为人类生存的前提，也必然是人类文明史开创和承续的前提。对于劳动地位的重要性，马克思明确指出：“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1](163)}“对象化劳动”这一创造性论断，标志着马克思走出了人本主义异化劳动的窠臼，并且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崭新的劳动观。物质生产劳动作为人类文明史的基础，成为人类文明真正开显的对象。随着劳动分工的日渐细化，以社会物质生产劳动为前提的人类文明史就变成

了“活劳动”不断转化为“物化劳动”的过程^①。这是因为，虽然劳动分工奠定了人类文明时代的基础，但是在恩格斯笔下的“文明时代”^②中，“在奴隶劳动、徭役劳动、雇佣劳动这样一些劳动的历史形式下，劳动始终是令人厌恶的事情，始终是外在的强制劳动”^{[2](615)}，致使“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观权力”的认识误区的出现，^{[2](267)}进而导致了“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的文明进步悖论^{[3](146)}。

为解决这一悖论，马克思、恩格斯通过继承、批判和超越先验理性主义哲学，从“现实的人”的需要、生产活动出发，深入剖析了劳动“作为生产活动”和“作为生命的表现和证实”的双重性，一方面指出劳动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之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另一方面又提出了如何实现“生产活动”与“生命表现和证实”的辩证统一。对于后一问题，他们通过一个重要概念“自主活动”找到了解析“生产活动”与“生命表现和证实”辩证关系的根本途径，进而也找到了解决“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文明进步悖论的出路。对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不相适应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以寻找“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为目标，做出了崭新的文明思想创见。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他们立足于人长期的自主活动和物质生产相分离的基本现实，指出阶级社会具有损害劳动者物质利益的独特属性，是导致“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这一文明悖论的根源所在。至于如何解决这一悖论，经典作家提出了“两个转化”的方案：即实现“过去受制约的交往向个人本身的交往的转化”“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因为只有通过上述两个方面的转化，“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人们“受制约的交往”的状况才会改变，进而“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的矛盾也才能得到根本解决^{[1](580-582)}。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明观致思路径中，“自主活动”具有核心地位。文明进步悖论的产生源于“自主活动”的丧失，而文明进步悖论的解决则依靠“自主活动”的实现。所以，“自主活动”是推动人类文明持续进步的基础。

二、文明进步的重要方式：从教化到阶级斗争与交流互鉴

通过寻找和使用“自主活动”这一把逻辑钥匙，

马克思、恩格斯开启了文明思想体系建构的工作。同时,在明晰“自主活动”作为人类文明持续进步的基础地位的前提下,马克思、恩格斯也迎来了新的挑战——探求推动文明持续进步的具体方式。在方式的探索上,由于持“文明进程是精神进步的历史”的观点,孔多塞等近代西方先验理性主义学者认为,理性的精神活动只属于少数人,认为通过完善少数人的认识能力就能够推动文明不断进步,进而把推动文明进步的方式归结为教化,这类观点对于人类认识文明图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在方式探索过程中做出了明显不同于先验理性主义思想家们的回答。唯物主义历史观是“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4](295)},它是以“一些现实的个人”及“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为理论前提^{[1](517)}。马克思、恩格斯立足于现实社会的物质生产实践,指出生产发展史是人类文明史的集中体现,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述道:“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1](519)}然而,由于丧失了“自主活动”的条件,生产活动、劳动并没有能够给人类带来解放,反而成为了自由的羁绊,这导致“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进而成为了人类文明史所呈现的规律^[5]。

通过对上述观点的提炼,可以看出,阶级对抗是人类文明面临的根本性难题。在阶级社会这一人类文明进程的特定阶段,“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随着文明而产生的社会为自己建立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原目的的反面”^[6],从而形成文明发展进程中的悖论。究其根源,这是因为文明的进步始终处于阶级关系对抗与缓和的相互更替的历史循环之中。对此,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揭示了“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4](196-197)},可见,积极处理阶级对抗问题也随之成为了贯穿人类文明史的一条主线。尤其是在“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文明”^{[7](175)}的资本主义文明阶段,“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3](288)},这两大根本对立阶级的出现,使得解决阶级对抗矛盾作为推动人类文明持续进步的重要任务更加凸显。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矛盾展开与矛盾解决的路径具有同一性,解决阶级对抗关系问题则要靠阶级斗争本身。随着奴役性“文明时代”的发展,在资本主义这一“文明时代”发展的高级阶段,无产阶级

走上了历史舞台,成为革命性的力量,他们将通过“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取得国家政权”等经济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活动^{[3](296)},实现“真正的普遍的文明”^[8]。

除了阶级斗争这一基本方式以外,多种类型文明之间进行积极的交流与互鉴,这有益于各民族的文明实现共同进步。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拉开了与世界各民族文明交流互通的大幕,“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9](35)},世界历史迈向整体进步的进程愈来愈快。大工业资本极大地促进了资本集中,“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每个人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1](566)}。在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思想的视域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活动也应该被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它们在推动殖民地国家文明进程方面的积极作用不容忽视。例如,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等著述中客观评价西方资产阶级给殖民地国家带来的历史影响,这集中体现在,“使人屈服于外界环境”的消极思想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得到了扭转,东方专制制度“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的落后状况得到了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首创精神,“把人提高为环境的主宰”^[682-683],从而对殖民地国家的文明进程发挥了促进作用。

三、文明进步道路的基本特征: 从单一性到多样性

在对文明进步基础和推动文明进步方式问题回答的过程中,文明进步道路的基本特征这一问题也随之产生,并且成为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作为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文明理论,往往由于缺乏历史辩证分析的视野,常常不遗余力地对自身文明进步模式加以赞扬,主观地忽视甚至漠视了其他民族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进步性。18世纪以来,由于持理性是文明进步的基础、少数精英主导文明进程的观点,孔德、基佐、达尔文等近代西方学者颇为得意地声称:一些西方民族属于“由于拥有足够数量的赋有高度理智与道德能力的人”^[10],所以能够成就人类文明进程的制高点。他们以西方社会为中心,对于世界进行了“中心—边缘—外围”的划分,一方面将西方资本主义视为“普世的现代文明”,另一方面又把脱离西方文明轨道的历史进程嘲讽为“野蛮”。

在马克思、恩格斯文明思想的逻辑理路中,人类

文明进程不是某一个或少数文明体的“独奏”，而是各种类型文明体共同参与演奏的“交响乐”，每一种文明都不可缺席。他们在对多国历史进行深入研究的过程之中揭示出了一个真理：世界上任何一种处于较高发展程度的文明，都不是凭借一己之力而是在博采众家之长的过程之中获得了自身的发展与进步。诸多历史材料表明，从古到今，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对话绵延不断、持续至今。例如，古代通过丝绸之路，宗教、农作物等文明成果纷纷自西向东，传入中国。与此同时，中国的“四大发明”也陆续传到欧洲，成为西方近代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基于文明进步道路多样性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提出，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文明进程立足于自身实际，而不是千篇一律。恩格斯以德国为例提出，由于“德国的文明已经很发达，除了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民主的和社会的德意志共和国这种形式，它不能以任何其他形式统治”^{[11][123]}。文明进步多样性的主张，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文明史做出的历史唯物主义注脚。

资本主义文明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不能将其作为文明发展进步的唯一形式。马克思毫不迟疑地肯定：资本显然具有“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12]的文明进步性。不过，马克思也对把资本主义文明模式神圣化的观点给予了态度鲜明的批判，例如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批评“‘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7](444)}，提出不能基于资本主义的世界霸权地位来否认人类文明进步的多样性、丰富性。在马克思看来，对于现代文明进步的普遍性要求不能仅停留在抽象的价值观念层面去理解。资本主义制度仅是体现这种要求的一种具体形式而已，而且还是具有显著异化特征的现代文明类型，因而不能以偏概全地将其等同于文明进步事业的唯一道路。

基于对人类文明发展道路多样性和对资本主义文明消极影响的认识，马克思提醒中国等东方国家在步入现代文明社会时要警惕，提醒他们应该科学看待东西方文明交流与碰撞。他在《中国记事》中提到，英国等西方国家倾销的鸦片对于中国民众起到了“惊醒”而不是“催眠”作用，他希望中国不要重蹈西方文明的覆辙，避免成为西方国家的附庸，主张中国人民要建设一种崭新的文明形态，超越“改朝换代”的历史陈旧意识，不仅如此，更要防止“破坏了一切，而什么也没建立起来”^[13]局面的产生。

除此之外，马克思通过对原始公社的研究，发现了多样化的文明进程史前状态，进而提供了文明进步

多样性思想的重要佐证材料。例如，通过对于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的研究，马克思发现，早在蒙昧、野蛮的史前社会，诸多部落向文明社会的过渡就已经呈现出了多样化的道路。例如，东方的村社所有制并非纯粹的公有制，耕地、林地归公有，房屋、园地及其他动产趋于私有化；而西方的村社所有制则是纯粹的公有制。进而言之，东西方社会的农村公社也具有两种发展趋向：一种是集体所有制代替私有制，公社制度长期存在；另一种则是私有制代替公有制，公社制度逐渐崩溃。对文明进步的多样史前状态的科学研究，使得人类文明进程多样性特征的论据更加充分，结论更加具有信服力。

四、文明进步的演进阶段：从“野蛮—文明”二元论到历史阶段论

通过对于文明进步的基础、推动文明进步的方式以及文明进步道路的基本特征问题的回答，文明进步演进阶段的逻辑理路也随之清晰地呈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之中。

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以前，由于从先验理性决定论和抽象人性自私论出发，一些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把私有制归结为人的“自我表现完善化能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文明的终极状态，进而对文明形态的历史演进做出了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划分，认为两者分别属于“野蛮”和“文明”阶段，并且把资本主义社会奉为人类文明进步史的终点。其实在西方思想史上，有许多学者对“野蛮—文明”二元对立式的历史划分方式，加以研究，并提出了怀疑意见。例如，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家傅立叶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乐园、蒙昧、宗法、野蛮、文明、和谐”六个阶段^[14]，并生动而深刻地提出所谓“文明”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具有虚假性，揭示资本主义文明只是人类进步历程中的一个阶段。然而遗憾的是，他没有看到文明的历史外延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阶段，同时也缺乏对文明演进历史阶段的科学划分。

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文明的进程做出了“奴隶制文明—农奴制文明—雇佣劳动制文明—真正的普遍的文明”四个阶段的划分。其中，作为“公开的奴隶制”的古代奴隶制、中世纪农奴制，和作为“隐蔽的奴隶制”的现代雇佣奴役制，囊括了“文明时代的三大时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4](195)}，与之相较，只有作为“真正普遍的文明”才是建立在“自主活动”基础之上的文明形态。

如上所述,由“强制劳动”转变为“自主活动”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进而言之,由劳动者处于奴役状态的文明阶段过渡到劳动者处于自主状态的文明阶段,则是人类文明历史进程的必然发展趋势。随着生产资料不断处于机器大生产的状态下,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仍然停留在中世纪式样的个体占有方式阶段,相应的矛盾就出现了“产品已经不归那些真正使用生产资料和真正生产这些产品的人占有,而是归资本家占有”^{[3](287)}。于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不适应性迅速凸显出来,集中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阶级之间的对立。然而,历史的辩证法也启示我们,随着阶级对抗、冲突关系的凸显,阶级斗争作为推动文明进步的主要方式,将推动人类文明由奴役状态向自主状态的不断进步。

历史的进步总是有它自身的规律。在社会基本矛盾规律的作用下,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显露出来,同时,日益增长的生产力“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3](294)},也就是使劳动力的作为活劳动的价值不再被束缚于货币资本逻辑的枷锁之中。作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资本主义私人占有方式将让位于更加适合社会化大生产的新型占有方式。这种崭新的生产方式包括两个方面的基本要求:一方面,社会直接占有生产资料;另一方面,个人直接占有生活资料。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具体阐述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社会生产的混乱无序,这“势必会把文明社会暂时抛进野蛮状态”^{[11](586)},而为了不致失去文明果实,这就要求无产阶级自觉承担起历史使命,通过革命斗争把生产力置于自身的控制之下,创造超越资本主义的文明,从而实现“真正的普遍的文明”。这种“真正的普遍的文明”就是处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文明,到那时,劳动不再是一种异己的、统治人的盲目力量,而是成为劳动者自觉控制下的“自主活动”。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真正的普遍的文明”形态的崭新特征和革命性意义进行了提炼,“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历史,这时人类实现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3](300)}建立在“自主活动”基础上的崭新文明形态,将会促使劳动能力重新复归劳动者,自由自觉的劳动进而会使人类文明摆脱恶性循环的状态,进入“真正的普遍的文明”阶段。

总的来说,以伏尔泰、杜尔哥、弗格森、孔多塞等为代表的西方近代先验理性主义文明思想家,将理性视为文明史的动力,提出了一种线性历史进步观,

这一系列思想在资产阶级反专制、反教权的斗争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思想动员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在扬弃和超越西方先验理性主义文明思想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具有开创性价值的历史唯物主义文明思想。一方面,他们充分肯定理性在驱逐蒙昧、在推动文明进程中的作用,肯定其“文明进步观”及“人创文明观”的理论贡献;另一方面,他们超越了将文明归功于头脑活动之先验理性决定论和满足先验自私人人性需要之本体还原论的思维范式。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思维方式,把文明看作人类自身社会生产实践活动的结果,看作社会变革完善的过程,从而消解了先验理性主义文明思想从价值预设的“应然”层面来解决“实然”状态等诸多非文明现象的抽象致思路径,在思想史上首次把伏尔泰开创的文明进步史观建立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基石之上。

注释:

- ①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集中论述了人类历史上伴随着劳动能力的提高而出现的三次社会大分工,并且认为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商业和农牧业的分离和商人阶级的出现)彻底瓦解了氏族制度赖以存在的前提。在此基础上,以国家为主要标志的文明时代进而开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80-185。
- ② “文明时代”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笔下具有特定的内涵,它是指一个建立在阶级剥削关系基础之上的社会发展阶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96-197。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04.
-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47.
-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725.
- [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
- [10] 达尔文.人类的由来[M].潘光旦,胡寿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216-217.
-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27-928.

-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5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2009：352.
545.
-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504.
- [14] 傅立叶选集：第 3 卷[M]. 汪耀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The four dimensions of ideological transcendence of Marx and Engels' civilization

LI Yanyan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Promoting the continuous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is the common value appeal all over the world, hence constituting the major topic for ancient and modern thinkers to explore. As the important achievements in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the thought of Marx and Engels' civilization has exerted a profound effect both theoretically and practically. A most important reason lies in that it provides a brand-new interpretation on the basis of western transcendental rationalism civilization with its manifestations as follows. First, based on the civilization progress, it puts forward the point of view of independent activity transcending the spiritual progress. Second, in the mode of civilization progress, it puts forward the view that class struggle and civilization communication go beyond enlightenment. Third, in terms of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ivilization, it puts forward the idea of diversity beyond oneness. Fourth, on the issue of civilization stage, it puts forward the binary view of "slavery civilization, feudal civilization, employment system, the real universal civilizations" beyond "savage - civilization". In the logic of the above four aspects to achieve the transcendence, the thought of Marx and Engels' civilization has brought about the breakthrough for humankind to perceive the theory of civilization.

Key Words: civilization; Marxism; transcendental rationalism; transcendence

[编辑：游玉佩]